

中國方術正考

李零 著



本书是李零教授的代表作之一。

第一次结合考古材料，系统总结了中国早期的方术知识，对中国科技史、中国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。

此次新版，李零教授作了全面修订，并撰写了「新版前言」，说明他研究方术的初衷，讲述对中国早期宗教传统的独特认识，从李零教授的文字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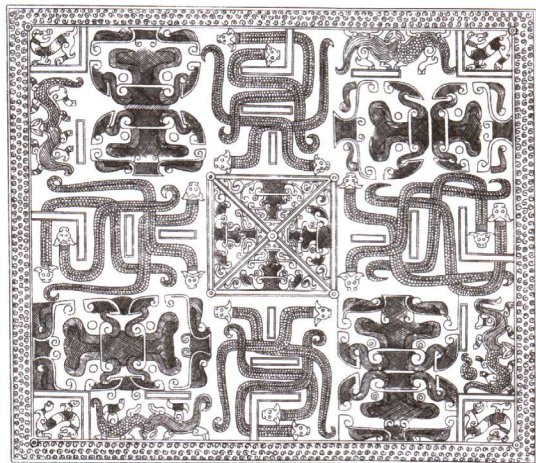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打通古今中外的学术情怀。



中華書局

中国方术正考

李零 著



 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方术正考/李零著.-北京:中华书局,2006

ISBN 7-101-04753-X

I.中… II.李… III.方术-考古-中国 IV.①B992②
K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79329 号

-
- 书 名 中国方术正考
著 者 李 零
责任编辑 樊玉兰 徐卫东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http: //www.zhbc.com.cn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-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版 次 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700×1000 毫米 1/16
印张 28 $\frac{3}{4}$ 插页 6 字数 350 千字
- 印 数 1-40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7-101-04753-X/K·2041
定 价 48.00 元
-



李零，生于1948年，祖籍山西武乡县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。1977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与金文资料的整理和研究。1979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，师从张政烺先生作殷周铜器研究。1982年毕业，获历史学硕士学位。1982-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队从事考古发掘。1983-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从事先秦土地制度史的研究。1985年至今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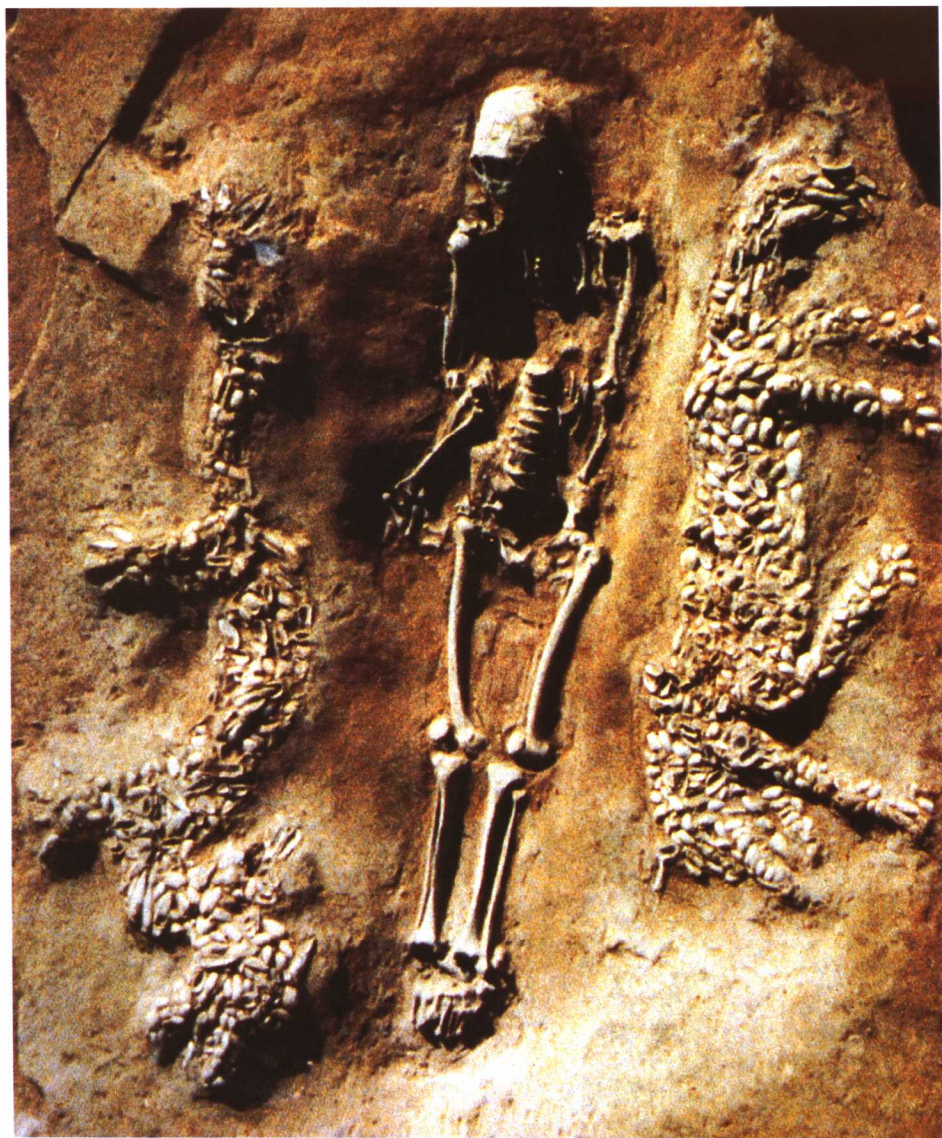
李零教授长期从事考古、古文字和古文献的研究，著有《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》、《放虎归山》、《中国方术(正)考》、《中国方术续考》、《〈孙子〉古本研究》、《吴孙子发微》、《郭店楚简校读记》、《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》、《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》、《花间一壶酒》等。



图版一 马王堆帛书《天天气象杂占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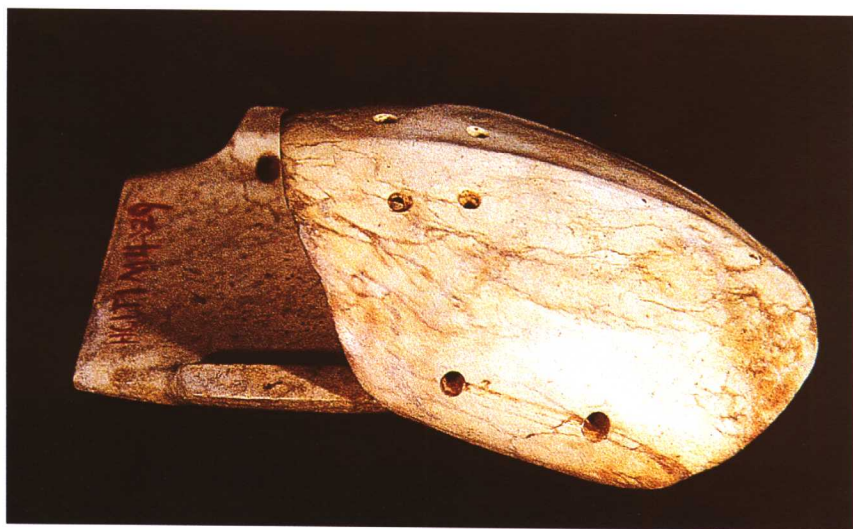
图版二 马王堆帛书《避兵图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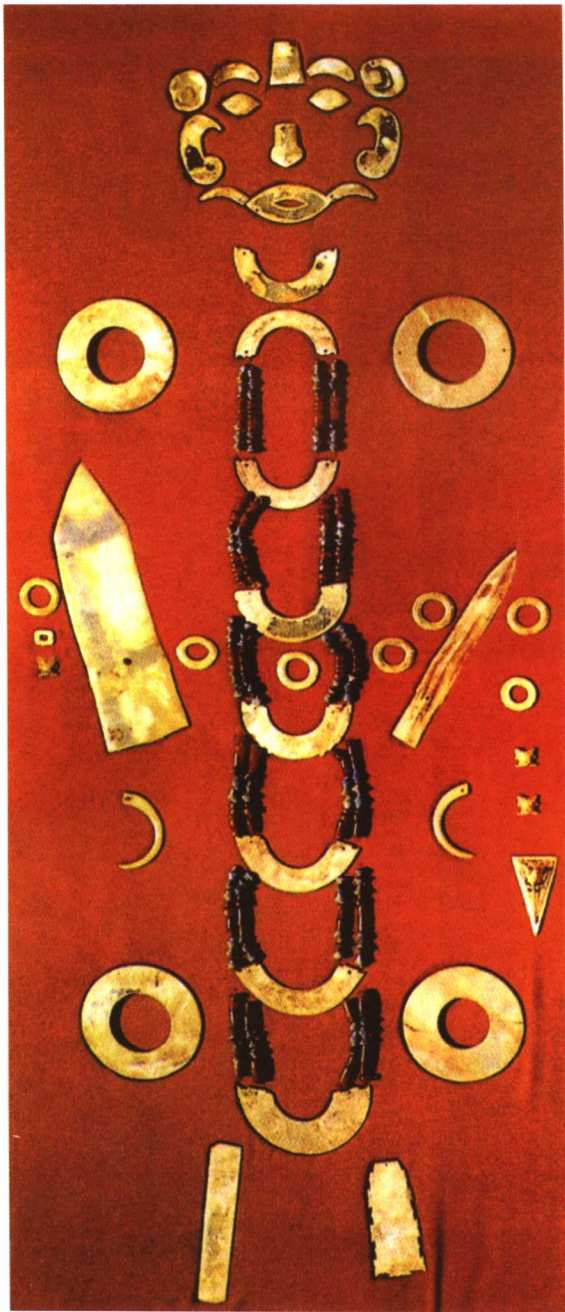
图版三 龙虎图



图版四:1 凌家滩玉片



图版四:2 凌家滩玉龟



图版五 人形玉组饰



图版六:1 商代玉羽人



图版六:2 汉代鎏金羽人铜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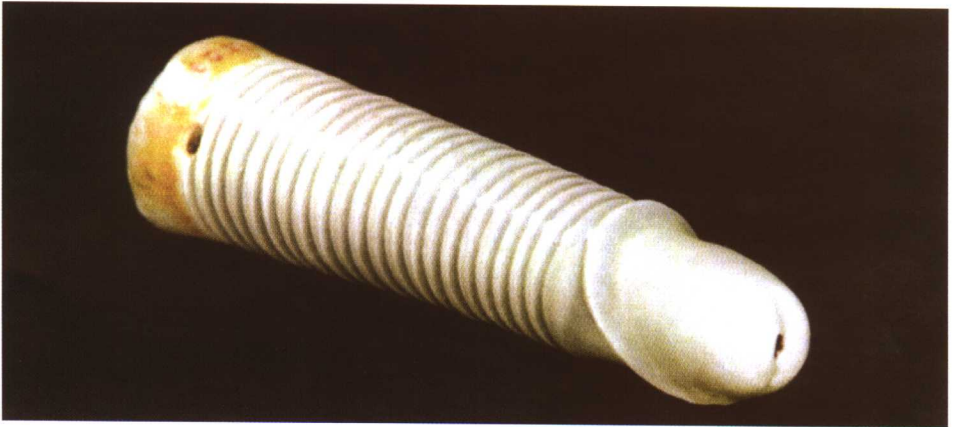
图版七 马王堆帛书《牝户图》



图版八:1 汉代铜触器



图版八:2 汉代铜触器



图版八:3 宋代瓷触器

新版前言

—

我写过十本书(不算与人合作的书),《中国方术考》(本次重版改名《中国方术正考》)和《中国方术续考》是我的两本代表作。不夸张地说,用考古材料填补空白,系统总结中国早期的方术知识(主要是战国秦汉的方术知识,或道教、佛教以前的方术知识),这是第一部——虽然,有些同行,自视比我高明,未必承认这一点。

前书写得早一点,动手在1989年~1990年,即我第一次出国的一年多里。出国前,我研究过楚帛书,研究过秦汉日书,翻译过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《中国古代房内考》,有一点积累。因为呆在美国没事干,我想把以前的想法总结一下,遂萌生了写《中国方术考》的想法。我写式盘,写房中书,都在那段时间。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演讲,也是这类题目。出国前的感受(“气功热”),当时的环境和气氛,我自己的心情,都比较适合写这本书。

书是写出来了,出版却碰到不少麻烦。

1990年,《中国古代房内考》的译本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该社的责任编辑说,他们还想出版我的《中国方术考》。不久,此人调到上海三联,书稿也转到那里。结果却是一拖再拖,最后连人都找不见。万般无奈,我只好登报声明,把稿子撤了(原稿一直没退)。1993年,我的书总算印出来了,由一个书商在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,也不太理想,错比较多,钱比较少(只给了原先答应的一半)。钱是没法办了,我希望,至少有机会把书中的错字改一下。然而机会来了,很快又去了。满口答应出台湾版的台北时报出版公司,因为换老板,竟成批毁约退稿,我的书也在其中。直

到2000年,北京的东方出版社才给我出了修订本。同时,作为前书的续补,他们还给我出了《中国方术续考》。转眼之间,十年就过去了。

人有几个十年?这是我最多灾多难的书。

前两年,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当客座教授。凑巧,李泽厚先生也在那里,他很重视我的研究,问我下一步有何打算。他希望我能扩大战果,最好是三考、四考,不断写下去。我很感谢他的鼓励,但自己的想法却是赶紧收摊。因为,我觉得,更重要的事情,不是就方术谈方术,而是另开局面,把它后面的东西,更高层次的东西,再发掘一下。

两考出版到现在,又是一个五年过去了,原来的合同已经到期。我很感谢中华书局,他们愿意给我出新版。借这个机会,我想在前面讲几句话,跟读者交流一下,让他们知道,我说的另开局面是什么意思。

二

首先,我想说一下方术的读者,即什么人最爱读方术。然后,就这个话题,说说我为什么要研究方术。

方术,于《汉志》六类,本来是属于它的后三类。它的前三类是六艺、诸子、诗赋,属于人文,后三类是兵书、数术、方技,属于技术。方术就是数术、方技的统称。技术在当时还是学术之半,有一定地位。但隋唐以来,按传统的四部分类,数术、方技只是子部底下的一个小分支,地位就不行了。读者,除了专门干这行,在司天监和太医院中供职的所谓“畴人”者流,只有闾巷卖卜的江湖术士和穷乡僻壤的愚夫愚妇。正经读书人,没有人要读它。

可我偏偏要读这类书。

现代读者,情况又如何呢?就我所知,主要是四种人。

第一种,是有信仰需求,迷信超自然,并活学活用的读者。正如刚才所说,他们才是方术最基本的读者群,最铁杆的读者群,古往今来长盛不衰的读者群。他们读方术,主要兴奋点有两个,一是算命,二是看病。我

的书,本来不是为这批读者写,但写信打电话,屁股后面追,热心读者是这种人。有些单位请我演讲,听众提问,也离不开这两大主题。我一再解释说,算命有地摊,看病有医院,这两样,千万别找我,我可不是干这个的——但我必须承认,方术本来就是干这个的。

第二种,是研究科技史的。这类读者,是近代才有。他们是到方术中寻找科学,属于沙里淘金。这不但提高了方术研究的层次,还可以和李约瑟先生的研究实行“国际接轨”。过去,研究古代,政治口号是“古为今用”。怎么用?典型说法是“去其糟粕,取其精华”。精华取出来,糟粕当然就不要了。原来的知识系统是什么样,他们不关心,淘金后的沙子更不用说。他们和第一类读者正好相反。前者关心的是沙子,他们关心的是金子。但金沙没有淘出,原来也是沙子。沙子比金子,更能反映全貌,光有这类研究也不行。这种人是专家,已经形成专门的研究队伍,但比起前者,人数少得多。

第三种,是我的同行。他们本来是学考古或古文字的,因为出土发现,这种东西越来越多,抓耳挠腮读不懂,才急用先学。我原来的出发点也是如此。中国方术,现在的知识,中国近代化以前的知识,主要是宋以来的知识。宋代以前,早期的知识,主要靠考古发现,一是简帛文献中的材料,二是敦煌文献中的材料,三是其他有关的出土实物。这些发现,主要是近百年的发现,特别是近30年的发现,说是新知识,也是老知识,或者更准确地说,是新发现的老知识。它们和宋以来的知识,其实是一脉相承。港台有一种偏见,我不同意。他们说,大陆的人文学科都不行,只有考古,一枝独秀。他们说的“独秀”,其实是发现,不是学科。发现是托祖宗的福。我的同行我知道,眼界、见识和水平,哪里就比别人高?这种人,数量更少,掰着手指,都算得过来。

第四种,是把方术当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资料看,特别是当宗教史的资料看。上面已经指出,方术这个混沌,既和科学技术有关,也和宗教迷信有关,但归根结底,还是和后者关系更大。我不信教,但信教是普遍的文化现象。最近,电视上说,调查表明,即使在科学昌明的今天,全世界,无

论用什么标准统计,信教的人都是多数,他们宁肯相信宗教领袖,也绝不相信政治家。研究中国历史,研究中国文化,研究中西对比,这个代表多数的想法,谁也不能忽视。迷方术,信宗教,人很多,但把方术当宗教史研究,人很少。真正关心这个问题的人,几乎等于零。

研究方术,我是作者,也是读者,而且首先是读者。上面四种,我算哪一种?主要是后两种。第一种,我是外道。第二种,我是外行。第三种,和我的专业知识沾一点边,但严格讲,就算这一种,也是非常边缘的研究,要叫行里人说,也不是玩意儿。我觉得,奇奇怪怪的术语,密密麻麻的图表,还有数不清的药方,本来就很枯燥,如果研究来研究去,只是为复原而复原,为前两种读者找材料,就没劲了(我是说,对我没劲,不是说别人)。第四种,我更关心,但对谁都是难题,对谁都是空白,我也好,别人也好,谁都是外行。

我经常说,学术有专攻,但问题是没有学科的,就像复杂的手术,必须请专家会诊。但专家如果不来会诊呢?

在这个领域里,我们的尴尬局面是,很多问题,都是搞的人不懂,懂的人不搞。

我用外行研究内行,用内行研究外行,自乱家法,原因在这里。

没有办法呀。

三

其次,我想说说,我对中国早期宗教传统的认识,目前最粗浅的认识是什么,也算是今后写作的设想吧。

在《中国方术考》2001年修订本的序言里,我曾许愿说,我要写三本我最想写的书,一本是《绝地天通》,一本是《礼坏乐崩》,一本是《兵不厌诈》。其实,这三本书的头一本,就是讨论中国的宗教传统。

“绝地天通”是个道理深刻的神话故事,出自《国语·楚语下》,大家都重视这个故事。故事的意思是什么?本来很清楚。它是说,天地神人

的交流,从前很容易,老百姓是通过民间的巫史,直接和神交流。后来,有了复杂的职官系统,则把这种关系断绝开来,神归神,人归人,世俗的事,由世俗官员管理,宗教的事,由宗教官员管理。任何人,都得通过这些神职人员,才能与神交流。也就是说,一旦宗教归国家管,归专责的神职人员管,僧俗分为二界,天地不分、民神杂糅的状态,就被彻底打破了。即使官民斗争,反反复复,也是这个格局之下的反复,大盘是定下来了。

我选这个书名,用意很明显,就是要澄清一个很流行的说法,也是相当糊涂的说法。

中国文化界讲中国文化,老是往自己脸上贴金,给人家脸上抹黑,张口闭口,都以“天人合一”自居,非说人家西方文化是“天人分裂”,两者拧着来,太物质,太技术,完全反自然,不像俺们中国文化是“天人合一”,和谐而美满。我不同意这种说法。起码照字面理解,“绝地通天”四个字,只能是“天人分裂”,而绝不是“天人合一”。

“天人合一”这个词,严格考证起来,其实并无深意。如宋人张载和王万,他们有这种说法(《张载集·乾称》、《宋史·王万传》)。现代学者的用法,是来源于宋。先秦没有这种说法。汉代的说法也不太一样。当时的流行说法,其实是“天人之分”、“天人之际”,“分”和“际”,都是讲天人的分别。当然,董仲舒是说过“天人之际,合而为一”(《春秋繁露·深察名号》),那是说,借助名号,把这两个本来是分开来的东西再合在一起,其实是讲天人感应。“天人之际,合而为一”,这是方士化的汉儒讲的话。“天人合一”,这是援释济儒、援道济儒的宋儒讲的话。两者都有宗教味。

“天人合一”是宗教话语,一点也不稀奇。任何文化的任何宗教都有这种东西。

这不是中国文化的特色。

中国文化的特色,在我看来,主要是一种结构性差异,即早在近代欧洲实行政教分离之前,中国的政教关系就已经是二元化,我们比他们更世俗,他们比我们更宗教。异是同中之异。中国和西方不同,并不是我们讲“天人合一”,他们讲“天人分裂”,而是两者在僧俗和政教的关系上有巨大